

中国早期青铜文化

——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中国早期青铜文化

——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对二里头文化墓葬、青铜器、玉器、石器和动物遗存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集。所收的5篇论文涉及墓葬的分期、类型、等级结构、埋葬制度与礼仪,青铜器的分期、生产工艺、礼器系统、源流演变与周边青铜器的异同,玉器的类型、分期、功用、源流传播以及玉器墓所反映的社会结构与礼制,磨制石器的微痕观察与功能分析,出土动物的种属鉴定、家畜判断与反映的气候环境和利用动物资源的方式等,从不同层面对二里头文化与中国早期青铜文明的社会结构、礼仪制度、生产工艺、生业方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内容充实,多有创新之处。

本书可供考古学者、历史学者和文物、博物馆部门的研究人员、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及考古、文物工作爱好者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ISBN 978-7-03-021621-2

I. 中… II. 中… III. 青铜时代文化—偃师市—文集

IV. K871.3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49475号

责任编辑:张亚娜 雷 英/责任校对:宋玲玲

责任印制:赵德静/封面设计:张 放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市京津彩印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8年6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1/16

2008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34 1/2 插页:5

印数:1—1 200 字数:803 000

定价:16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京津〉)

序

这里刊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硕士研究生李志鹏、陈国梁、郝炎峰、谢礼晔、杨杰五位同学的毕业论文。他（她）们的研究对象，都是著名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和以二里头遗址为主的二里头文化，而选取的题目，则有墓葬、青铜器、玉器、石器、动物遗骸研究。

二里头文化是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中的独秀之花，二里头遗址则是二里头文化的核心与灵魂。自二里头遗址发现以来，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一直是人们热烈讨论的对象，有数以百计的论文发表，成为一个令人称奇的学术景观。时至今日，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不仅魅力不减，而且愈发引人入胜。本书作者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势必推动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更进一步。

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有个显著特点，就是始终与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上的一个重大争议问题——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都抑或商都、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抑或商文化紧密相关。当初，徐旭生先生等前往豫西踏查“夏墟”，根据文献线索顺道寻访“汤都西亳”，来到偃师二里头村一带，发现这里遗址规模庞大，文化面貌与先前发现的郑州洛达庙遗址等相仿，联系到古代文献关于汤都西亳地望的记载，推断这里应是一代帝都，可能就是商汤亳都遗址。接下来的发掘，尤其是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一号宫殿）的发现，更加坚定了人们对这个假说的信任。十几年后，爆发了“西亳说”与“郑亳说”的论战，二里头遗址成为主战场。正是因为上述学术背景，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研究，不免受其影响而走上了—条特殊的道路。田野考古在遗址内涵、文化分期、文化源流以及年代等方面，用力甚笃，而讨论的核心则是文化性质。可以说，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性质的争论，在某些方面促进了二里头遗址的发掘研究，而在另外某些方面则牵制了二里头遗址的发掘研究。偃师商城的发现与发掘，逐渐使二里头遗址从学术争执的漩涡中挣脱出来，使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研究，有了反思和规划的机会。很显然，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应该加强基础性工作，“补课”性质的研究项目，亟待开展。

本书收录的五篇论文，就是在新学术形势下选取的研究课题，它们很好地补充、加强了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的空白和薄弱环节，使得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在基础研究方面，变得丰满起来。

这五篇论文，各有特色，相映生辉。

李志鹏《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就各地二里头文化墓葬之发现与研究的历史与现

状、分期、类型、等级、埋葬制度以及墓葬反映的礼仪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阐述。这是迄今为止对于二里头文化墓葬最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论文。作者对于二里头文化墓葬出土陶器和青铜器的类型与分期研究、墓地制度研究、墓葬体现的礼仪制度及其反映的社会形态的研究等，为前人极少涉猎或未曾探讨过，其见解很值得关注。文章将二里头文化墓葬分为四期7段，归纳了各期墓葬出土陶器、铜器的型式；认为二里头文化墓葬等级分化明显，不同等级墓葬之间的墓室规模、葬具使用、随葬品组合等皆呈现等列现象，表明当时社会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在墓地制度方面，呈现出聚族而葬的特点，说明当时的社会分层并未与血缘关系截然分开。作者对墓葬反映的礼制做了分析，认为二里头文化时期严格意义的礼制已经形成，青铜器与玉礼器、陶礼器、漆器等共同组成礼器群，构成了二里头文化礼器制度的基本特征，并真正确立了以酒礼器为核心的礼器组合，奠定了三代礼器制度的基础。二里头文化礼器制度及其规范化推动了二里头文化的政治结构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

陈国梁《二里头文化铜器研究》的内容属学科前沿课题，对于探索以礼乐为核心的中国青铜文明的发生与初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在系统梳理二里头文化铜器材料、吸纳消化以往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二里头文化铜器的分类分期框架，讨论了二里头文化铜器的制作工艺及其特点，以及该时期冶金技术在中国古代冶金史上的地位，进而深入探讨了二里头文化铜器发生质变的原因、铜器组合和礼器系统的产生和发展。作者陈国梁自大学毕业起即在二里头遗址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也坚持参加考古发掘，这一特殊的学术背景使其能够较为系统全面地收集材料，有利于发掘原始材料的底蕴，对相关问题的探索也较为深入。该文最突出的特点，是将二里头文化铜器的发生与发展放在一个大的时空框架中做宏观的比较分析，因而其立论基础更为扎实。其研究起步自考古学文化，进而及于冶金技术与社会结构的探讨，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对该课题研究的深化将起到推进作用。而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冶金技术、铜器组合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变化等问题，还有待考古发现与多学科合作研究的深入进行。

关于二里头文化玉器，学者在以往的论述中曾提及，但是专文讨论十分罕见，系统研究更是缺乏。郝炎峰《二里头文化玉器的考古学研究》在系统梳理考古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类别、型式、特点、分期、用途及其发展演变等考古学研究，并浓墨重彩地讨论了玉器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作者不仅仅是把出土玉器看作艺术品，更希望透过玉器，观察人类社会。因此，他把这些精美的出土玉器还原回各自的墓葬单位中，结合这些墓葬的种类等级，探讨玉器、玉器墓与社会等级、礼仪制度的关系。又将玉礼器与陶礼器、青铜礼器的社会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做了比较研究。

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大量类型多样的磨制石器，它们的功能如何？它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了当年二里头的建设？谢礼晔同学的论文《二里头遗址石斧和石刀的微痕分析——微痕分析在磨制石器功能研究中的初步尝试》，在精心设计的实验基础上，对二里头遗址的石斧和石刀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显微观察和分析，得出

了许多值得关注的认识。以石斧为例，作者根据二里头遗址石斧使用痕迹的特点，将78件出土石斧分成四组，认为这四组代表着不同的功能类型，且每组石斧的功能可以转换，且转换有一定的方向性。结论是石斧的功能非常复杂，每件石斧的功能都是多样的。尽管目前的研究还无法确知每组石斧的功能到底是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砍树和砍木材之类以往被认为是石斧的主要功能的作业内容，只属于对石斧损耗最小的那类工作，处于石斧利用流程的开端。尽管这篇论文对二里头遗址石斧和石刀的微痕研究目前还未能提供有关它们功能的确切答案，但是已经获取了前所未有的大量信息，初步揭露出磨制石器功能的复杂性，为今后深入了解二里头遗址磨制石器的功能开辟了新的道路。

迄今为止，关于二里头遗址出土动物遗骸的研究基本上无人涉及。杨杰的《二里头遗址出土动物遗骸研究》可谓是填补空白之作。他对二里头遗址多年来出土的39429块动物遗骸进行鉴定和统计，结合考古学文化分期开展研究，探讨了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及其变迁，揭示了各个时期被人利用的动物种类、数量及主要动物的肉量，全面复原了各个时期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状况。他还对生活于该遗址不同性质区域的古代居民利用动物的行为进行对比分析，提出认识。通过与年代处于二里头遗址前、后期的两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比较，更加全面地认识多种动物资源在二里头遗址古代居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另外，他在文章中还对部分卜骨及骨、角、蚌器的加工方法和原料选取进行了分析。而作为附录的二里头遗址各期动物遗存的出土状况、测量数据及各种统计，则为同行们的再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原始资料。杨杰成功地迈出了对二里头遗址出土动物遗骸开展研究的第一步，值得充分肯定。至于他在论文中专门提到的由于筛选没有到位引发的问题，则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掘和动物考古学研究来解决。相信二里头遗址出土动物遗骸的研究，一定会在此基础上越做越好。

在论文答辩通过之后，各位作者根据答辩委员提出的问题，又进行了反复修改，尽量使文章更臻完善。当然，即便如此，这还只是习作，存在的欠缺乃至错误，也还不少，有待于作者们在将来的科研实践中予以弥补。

荀子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愿李志鹏诸君以此为起点，在考古学的千里旅途上，稳步前进！在学术园地里，默默、执著地劳作，让考古之花，四季开放！

今夜星光明媚，明朝阳光灿烂。

期许的目光，关注着即将踏上征程的战士！

目 录

序	(i)
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	李志鹏 (1)
二里头文化铜器研究	陈国梁 (124)
二里头文化玉器的考古学研究	郝炎峰 (275)
二里头遗址石斧和石刀的微痕分析——微痕分析在磨制石器功能研究中的初步尝试	谢礼晔 (355)
二里头遗址出土动物遗骸研究	杨 杰 (470)
编后记	(540)
作者后记	(541)

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

李志鹏

二里头文化是中原地区最早步入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聚落形态和物质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学者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的社会发展水平已经进入到国家阶段，同时它也是探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及夏文化的主要对象。

自1953年在河南登封玉村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存^[1]，50年来已经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不少于250处，经过正式发掘的50多处。依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判断，二里头文化的分布中心是河南中、西部的郑州、洛阳地区和山西西南部的运城、临汾地区，向西突入陕西关中东部、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及豫鄂交界地带，往东至少分布到豫东开封地区，北抵豫北沁河岸边^[2]。

二里头文化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该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自1959年首次发掘以来，获得了众多举世瞩目的重大发现：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和宫城城垣，以及纵横交错的道路遗迹；发掘了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数座，大型青铜冶铸作坊遗址1处，制陶、制骨、制绿松石器有关的遗迹若干处，与祭祀有关的建筑遗迹若干处，以及中小型墓葬400余座，包括出土成组青铜礼器和玉器的墓葬。此外还发现并发掘了大量中小型房址、窖穴、水井、灰坑等遗迹，出土了大量陶、石、骨、蚌、铜、玉、漆器和铸铜陶范等^[3]。这些方面都显示了二里头遗址不同于一般聚落的都邑文化的重要内涵。而迄今发现的其他二里头文化遗址，无论规模还是内涵都远无法与二里头遗址相比，聚落之间显示出多层级的等次性。从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形态、埋葬制度所体现的社会分层、政治结构的变化，从手工业生产规模、青铜器的生产、奢侈品的远程交换所反映的社会发展水平，都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已经出现国家水平的社会组织^[4]。

墓葬是二里头文化极为重要的发现之一。从墓葬材料出发，研究古代社会丧葬习俗、社会结构及其礼制，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已有学者从龙山时代的墓葬材料出发，从考古学上探讨礼制的起源，指出“礼乐制度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可谓形影相随。应承认它是中国文明固有的特点之一”，“应该把礼乐制度的形成视为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一项标志”，而“礼制形成于龙山时代”^[5]。了解龙山文化的社会结构是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关键，而学者多认为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处于国家最终形成的阶段，了解其社会结构和礼制，对研究中国古代早期文明和国家的形成及特质，无疑同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有学者指出,墓葬是二里头最好的物质文化资料,也是推知社会结构的主要命脉^[6],而墓葬礼制也是推测国家发展的重要指标^[7]。本文在对二里头文化墓葬进行分期的基础上,着重对墓葬的等级结构、分布形态和墓葬所反映的礼制等问题进行探讨,试图通过对墓葬材料的梳理和分析进一步解读二里头文化的社会结构和礼制。

一、二里头文化墓葬的发现与研究概况

1. 二里头文化墓葬的发现

自二里头文化遗存发现至今,已发现 500 多座墓葬,其中二里头遗址共发现墓葬 400 余座,在二里头遗址以外的地点也发现 100 多座。

二里头遗址历年发现的墓葬简况如下:

1959~1978 年共发掘 108 座^[8]。

1980 年在 V 区发掘 1 座, VI 区发掘 6 座^[9]; 1980~1981 年在 III 区发掘 6 座^[10]; 1981 年在 V 区发掘 6 座^[11]; 1982~1983 年在 IX 区发掘 21 座^[12]; 在 IV 区发掘近 50 座^[13]; 1984 年在 IV 区发掘 40 余座^[14], 在 VI 区发掘 10 余座^[15]; 1985 年在 VI 区发掘 20 多座^[16]; 1986 年在 VI 区发掘 18 座^[17]; 1987 年在 VI 区发掘 56 座^[18], 在 V 区发现铜器墓 1 座^[19]; 1989 年在 VI 区发掘 6 座^[20]; 1994 年在 XII 区发掘 3 座^[21]; 1995 年在 IX 区发掘 30 座^[22]; 1997 年在 II、V 区发现 5 座^[23]; 2001~2002 年在 V 区发现 5 座^[24]; 2002~2003 年在 V 区发现 1 座^[25]。

二里头遗址以外地点的墓葬发现概况如下:

1956 年, 郑州洛达庙发现 16 座^[26]; 1956、1958 年, 洛阳东干沟发现 7 座^[27]; 1958~1959 年, 郑州上街发现 5 座^[28]; 1958 年, 陕县七里铺发现 8 座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墓葬, 在出有随葬品的 3 座墓中, 2 座属于二里冈文化下层, 1 座属于二里头文化, 无随葬品的墓葬年代尚不能确定^[29]; 1959 年, 偃师灰嘴和渑池鹿寺各发现 1 座^[30]; 1960、1963 年, 巩县稍柴共发现 6 座^[31]; 1966 年, 洛阳东马沟发现 11 座^[32]; 1971~1974 年, 浙川下王岗发现 6 座^[33]; 1974~1979 年, 夏县东下冯发现 31 座^[34]; 1977~1981 年, 登封王城岗发现 4 座^[35]; 1979 年, 荥阳西史村发现多座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墓葬, 其中能确定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有 6 座^[36], 洛阳吉利东杨村发现 8 座^[37], 伊川白元发现 5 座^[38]; 1985 年, 渑池郑窑发掘 4 座^[39]; 1989 年, 邓州穰东发现 1 座^[40]; 1990~1991 年, 伊川南寨遗址发现 25 座^[41]; 1992 年, 驻马店杨庄发现瓮棺葬 1 座^[42]; 1997~1998 年, 陕西商州东龙山发现 14 座^[43]; 1998~1999 年, 河南西平上坡发现 8 座^[44]; 2002 年, 荥阳大师姑发现二里头文化墓葬 5 座, 其中可确定期别的有 2 座^[45]; 偃师灰嘴发现 2 座^[46]; 2004 年, 登封南洼发现 8 座^[47]。

从目前的墓葬发现来看, 不同遗址所做的考古工作很不均衡。比如二里头遗址墓葬

发现较多，共发现二里头文化墓葬约 400 座，而在二里头遗址以外的地点，仅发现墓葬 100 多座。发现的墓葬中目前还未见有大型墓，这制约了我们对墓葬材料全面、深入地研究社会结构和礼制。另外，二里头文化发掘的墓葬也仅发表了一部分，并且也往往是选择较为重要的墓葬和随葬品发表的，而对墓葬之间的关系交代不多，墓地的平面图几乎没有，这无疑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不利。

2. 二里头文化墓葬的研究概况

二里头文化墓葬是研究二里头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涉及墓葬及与墓葬相关的文章很多，但关于墓葬专题研究的文章并不多。本文主要针对这方面的文章作概要综述。

(1) 从墓葬研究二里头文化性质和夏商文化分界

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和夏商文化分界是夏商考古学的重要学术课题。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争论十分激烈，发表文章数量也相当多。专门从墓葬研究的角度作这方面探讨的文章也有一些。其代表为刘绪和杨锡璋两位先生。

刘绪先生《从墓葬陶器分析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及其与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关系》一文，通过对墓葬陶器的分析，探讨了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及其与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关系。依据对二里头文化早、晚期以及二里头文化晚期与二里冈期墓葬陶器的分析比较，他认为二里头文化早晚两期墓葬的陶器显然属于同一文化系统，不可能划分成两种文化，而二里头文化晚期和二里冈期下层墓葬的陶器，无论在器物群体，还是在器物组合及特征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远比二里头文化本身早、晚两期之间的差异大得多，这绝不可能是同一文化本身不同阶段的自然演进所致，而应该是经过剧烈的文化变革的结果。二里头文化晚期和二里冈期文化下层之间的变化是主要的，夏商文化的界限应该就划在这里；二里头文化各期之间的变化是次要的，应该不是两种文化的分界^[48]。

杨锡璋则从二里头文化与商文化的墓葬制度和随葬陶、铜器组合的比较来探讨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并从随葬陶器组合的变化上讨论二里头文化是否经历了夏、商两个时代的问题。

杨先生通过对二里头文化与商文化墓葬的墓圻形制、二层台和腰坑的有无、是否用狗殉葬以及墓葬葬式等的对比分析，认为二里头文化与商文化在墓葬制度上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反映了夏商两族在文化传统上的区别。另外在埋葬习俗上，他认为，在随葬铜器组合上，二里头文化以单爵或双爵作为组合，商文化则以觚爵作为核心的组合；在墓葬陶器组合上，二里头文化以盃、爵为核心，商文化以鬲为核心。因此二里头文化与商文化的墓葬制度和陶、铜器组合皆不相同。葬制不同，反映了创造考古学文化的人们共同体的不同，即族的不同。商文化是以商族为主体的人们共同体创造的，而二里头文化则是以夏族为主体的人们共同体创造的。

在讨论二里头是否经历了夏、商两个时代的问题时，杨锡璋认为历史朝代的更替和

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是两回事，不能想象，在以商族为主体的共同体成了中原地区的统治者以后，商文化会一下子代替夏文化。他通过对商周政权更替后原商文化区域的文化发展现象的分析，指出周灭商以后，在文化上真正替代商文化用了近百年的时间，由此他认为，在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发展过程中，即使在某一阶段发生了夏商政权更替的政治事件，在陶器的质料、器类、器形和纹饰上也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但是他又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墓葬的制度与此不同，随着政权的更替，这方面就会反映出来。因此他分析了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随葬器物组合的变化，指出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时，在二里头遗址内并未发现随葬以陶盃、陶爵为核心的墓葬，只在远离伊洛地区夏人活动中心的夏县东下冯和荥阳西史村发现个别的用陶盃、爵随葬的墓，而且还发现随葬铜爵及陶鬲、盆、罐的新的组合形式。联系二里头文化四期时二里头遗址的诸多衰落现象，他认为二里头文化四期已经进入商代纪年范围，即使在陶器的制作上，仍基本保持原文化的风格，但在随葬器物组合上发生了变化，一些人仍保持旧的组合形式，一些人则接受了新的组合方式，显示了新旧交替时的混乱现象。因此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都是夏代的夏文化，但在第四期时已经进入商代历史的纪年范畴^[49]。

缪雅娟、刘忠伏两位先生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墓葬随葬品的分析，指出二里头文化墓葬各期都呈现出一种文化上的继承和发展趋势。随葬器物中呈现的这种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趋势，表现了二里头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同时也表现了二里头文化作为一支独立文化的一脉相承的共性。由此作者联系二里头遗址各期文化遗存的内涵，认为二里头遗址作为都邑使用一直延续至四期，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作为都邑的二里头遗址文化的衰落，应和商灭夏的历史事件有关。在中原地区，继二里头四期文化之后，代之而起的是以偃师、郑州两座商城为代表的商文化^[50]。

郑若葵先生通过对二里头文化墓葬内涵的全面分析，认为二里头文化墓葬从一期至四期均有着文化和时间发展上的内在联系，相对而言，一期墓葬较多地存留着河南、山西龙山文化的色彩，而四期墓葬则较多地显露出二里冈下层期的特色，但一、四期文化显然与二、三期文化有着不可分离的质的联系，是属于同一大阶段内发展略呈先后的相对独立的文化共同体。他进一步认为，龙山文化与二里头、二里冈乃至殷墟文化，是一脉相承、延绵发展的，是不同阶段同一大民族的文化，夏、商文化的区别，不应是族（民族）的区别，而应是时间先后或王朝递嬗的区别，二里头一至四期文化所代表和反映的应是有夏禹至桀夏王朝统治时代的中心区域文化。二里头四期文化与二里冈下层文化在文化特质上是不能完全画等号的^[51]。

郑光先生在《二里头文化陶器论略》一文中简要分析了墓葬中各期随葬陶器的组合变化，对陶器组合所反映的丧葬习俗及其流变进行了一些探讨，认为各期随葬器物组合的变化只反映习俗的变迁^[52]。

（2）综合研究

缪雅娟、刘忠伏所撰《二里头遗址墓葬浅析》一文，在对二里头遗址历年发掘的

墓葬材料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对二里头遗址墓葬的形制、葬式、头向、葬具、随葬品、墓葬分布的特点进行了探讨。其中着重对二里头遗址墓葬分布区域、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二里头文化目前发现的墓葬多分布在Ⅲ、Ⅳ、Ⅴ、Ⅵ、Ⅸ五个区,其中Ⅳ区北部、Ⅴ区是宫殿区,位于整个遗址的中心部位。认为据现有资料,各型墓分布的情况大致如下:大型墓及中型墓多分布在Ⅴ区附近,中型墓则基本集中在宫殿区略偏北的东西一线,此外Ⅵ区一带也可以视为二里头遗址中型墓的一处重要分布区;儿童墓主要发现在遗址的南北两端;乱葬墓则多集中在一、二号宫殿基址附近的灰坑或灰层中。作者同时指出,二里头遗址各型墓葬呈现参差分布、不易划分固定埋葬区域的特点,在二里头文化时期该遗址内似未形成比较固定的墓葬区,尚无不同身份、不同等级的不同埋葬区域^[53]。

郑若葵先生则对二里头文化墓葬历年发表资料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系统统计,从墓葬形式、葬俗、随葬品及其组合、朱砂葬等诸多方面对二里头文化墓葬内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并对各期的陶器组合等的变化做了细致的梳理^[54]。

袁广阔先生对二里头文化墓葬在遗址内的分布规律、墓葬分期、埋葬方式的来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他认为二里头遗址的墓葬遍及整个遗址,似乎还没有固定的埋葬区域,特别是形制较大的墓葬分布并无规律。相比之下,数量众多的小型墓发现有集中分布的现象。二里头文化小型遗址有较固定的埋葬区域,各墓地内的葬式、头向基本一致,随葬品的组合虽有差异,但有大致的规律,特别是器物的组合在一个遗址中虽然其时代发生了变化,但在相当大的时空范围内仍有规律可循。在墓葬分期方面,他仍然采用四分法,但对二里头文化墓葬第二期进行了早晚阶段的细分。他分析指出,伊川南寨、偃师二里头等遗址从二期早段开始,其小型墓内就出现不少白陶酒器等精美的随葬品,这表明二里头文化的繁荣当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而二里头二期中型墓的较多发现,则表明二里头遗址在这个阶段已成为当时政治的中心。

关于二里头文化埋葬方式的来源,他通过对颍、沙、汝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墓葬和二里头文化墓葬的分布特点、葬具、随葬品组合和形制的比较研究,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埋葬方式多是吸收颍、沙、汝河流域的龙山文化的埋葬方式后发展起来的,而二里头文化墓葬内带有东方色彩的盃、鬻、觚等,是主要吸收颍、沙、汝河流域龙山文化的因素发展来的,至于这一地区龙山文化墓葬的不少习俗则是受大汶口文化向西扩展的影响而形成的^[55]。

张剑先生对洛阳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的分布特点、文化分期、墓葬形制和分类、墓葬的来源与影响也进行了探讨^[56]。

关于二里头文化墓葬的研究从时间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者开始对二里头文化墓葬进行专门研究,但其着眼点主要是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和夏商文化分界,这与当时整个夏商文化研究大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趋向有关。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全部为夏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四期进入商代纪年的两种

认识，但所有从墓葬角度研究二里头文化性质的学者都指出其主体是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因为墓葬是最能反映一个文化共同体特质的载体，研究二里头文化墓葬的学者观点的相对趋同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对二里头文化性质各家聚讼纷纭的现象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第二阶段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对二里头文化墓葬开始出现综合和深化研究的趋势，资料统计更为详尽，研究的问题更为全面细致，比如对二里头文化墓葬分期、随葬品组合和埋葬方式来源等都有较深入的探讨^[57]。

总的来看，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已经从当初限于文化性质的探讨向更深入的方面着手，研究文章多有创见，墓葬研究涉及范围也较为全面。但我们也可以看出，对二里头文化墓葬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的研究基本没有或失之简略，对二里头文化墓葬所反映的礼制也没有深入探讨，对二里头文化各期反映的社会变化有时分析不够深入，且往往偏重于对夏商更替、王朝变化的讨论。这或因墓葬材料所限，或因研究者的认识和研究方法各有不同，当然和整个学术趋向也有很大关系。

二、二里头文化墓葬的分期

要研究社会结构的演变，必须对一个文化做动态的考察，而文化分期是必要的前提，因此二里头文化墓葬的分期是研究二里头时代社会结构和社会演变的阶段性的基础。本文墓葬分期是在以往学者文化分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墓葬材料的特别考察，分期框架仍为四期划分法，除一期由于墓葬发现数量太少未做更细的划分外，其他各期分别细分为早晚两段，而在具体各期归属及特征的界定上，有一些调整。总之，对二里头文化墓葬分期是以地层学和类型类为基础，在同期器物的器类组合和特征的归纳上，尤其注重对同一墓葬共出器物的综合考察。

（一）二里头文化分期的研究概况

二里头文化分期是以二里头遗址的分期为基础的。1959 年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在试掘中发现所谓的“从龙山晚期到商代早期连续发展的三层文化堆积”，并根据出土遗物的不同，分为早、中、晚三期^[58]。到 20 世纪 70 年代前期发掘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基址时，新发现打破台基的灰坑、墓葬和台基附近与其同时的遗存，从所出陶器形态上来看，它是介于原二里头文化晚期和二里冈期商文化之间，因此发掘者将其定为二里头第四期遗存，而将以前的早、中、晚期改称第一、二、三期^[59]，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的基本框架由此形成。

此后，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报告和有关论文，基本上都同意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60]。只是，大家虽然皆持四分法，但在具体的划分上还有所不同，这是学者间在把握分期的方法、标准以及对有关材料的认识、使用上存在差异（甚至还牵扯到各自的

学术体系之不同)而造成的^[61]。

我们认为二里头文化应限于 20 世纪 70 年代所分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遗存的范畴。由于墓葬随葬器物的共时性要比遗址其他地层单位所出器物的共时性更强,而目前二里头文化的墓葬材料已较为丰富,因此单从墓葬器物入手就可以对二里头文化分期做较为细致而系统的研究。

(二) 陶器类型与型式划分

我们对二里头文化墓葬陶器的分期,选择比较常见的鼎、圆腹罐、鬻、盃、爵、觚、豆、簋、三(四)足盘、平底盆、盆、大口尊、瓮、高领小罐作为典型器物进行型式排比(图一)。其中,分期图中未标明遗址的器物皆出自二里头遗址。

鼎 依形态可分为三型。

A 型 高领罐形鼎。可分两个亚型。

Aa 型 侈口,肩部圆鼓,有无耳、有耳两种。可分三式。

I 式:高领,圆腹。足较靠下腹,有耳者耳横跨口及上腹部,圜底。二里头 II·V M56:3,薄胎,灰褐陶,腹饰线纹,纹痕较深,内壁印有松散的细绳纹。

II 式:高领,圆腹或扁圆腹。耳横跨颈及上腹部或装在上腹部,扁三角形足近中腹,圜底。二里头 V M23:8,夹砂灰陶,腹饰绳纹。

III 式:高领,口部外侈角度较大。扁三角形足装在中腹,凹圜底。二里头 1987 VI M25:4,夹砂灰陶,口部附双螯,腹饰绳纹及一道凹弦纹。

Ab 型 领较直。可分三式。

I 式:高领,颈微侈,扁三角形或锥状足较靠下腹,有耳者耳横跨口及上腹部,圜底。二里头 II·V M57:6,夹砂浅灰陶,手制,有流,饰散乱粗绳纹。

II 式:高领,颈较直,唇部加厚形成一道宽边。足装在近中腹处,有耳者耳横跨颈及上腹部。圜底。二里头 II M105:4,夹砂深灰陶,腹部饰竖绳纹。

III 式:高领,厚方唇,圆腹或扁圆腹,平底。耳装在上腹部,扁三角形足装在中腹或略靠上腹,平底。二里头 V M15:16,夹砂深灰陶,腹饰绳纹。

B 型 折沿罐形鼎,可分三式。

I 式:窄折沿上仰,短直领,肩部略显,与腹部相接较浑圆,扁三角足安于腹下部。二里头 IV M26:2,夹砂红褐陶,器表饰粗线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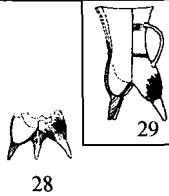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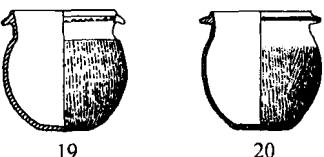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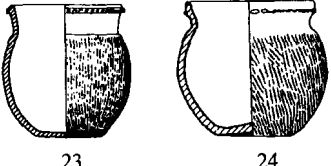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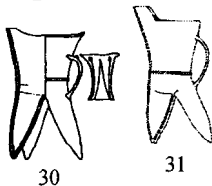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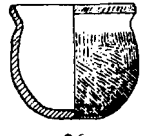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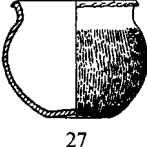
II 式:窄折沿上仰,敛口,肩部浑圆,圜底。扁三角足安于近中腹处或中腹。南寨 M19:1,腹部饰浅篮纹。

III 式:窄折沿上仰,侈口,肩部不甚浑圆,圆腹,扁三角足安于中腹或较靠上。二里头 1982 IX M15:1,夹砂灰褐陶,上腹部饰对称双螯,身饰绳纹。

期 段	器 类 型 式	鼎				圆腹罐	
		A型		B型	C型	A型	Ba型
		Aa型	Ab型				
一 期	1 段						
	2 段						
	3 段						
二 期	4 段						
	5 段						
	6 段						
三 期	7 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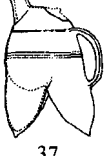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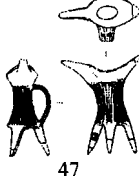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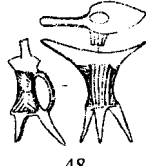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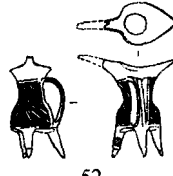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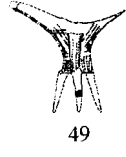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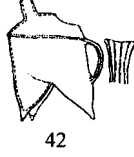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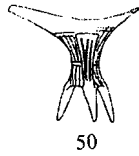
图一 二里头文化墓

1. Aa型I式鼎(Ⅱ·VM56:3) 2. Aa型II式鼎(VM23:8) 3. Aa型III式鼎(1987VM25:4) 4. Ab型I式鼎(Ⅱ·VM19:1) 9. B型III式鼎(1982IXM15:1) 10. C型I式鼎(1984IVM51:10) 11. C型II式鼎(南寨M28:6) 12. C型III式鼎M15:7) 16. Ba型III式圆腹罐(1980ⅢM3:1) 17. Ba型IV式圆腹罐(1987VIM28:1) 18. Ba型V式圆腹罐(VM51:1) 圆腹罐(1987VIM23:1) 23. C型I式圆腹罐(1982IXM10:1) 24. C型II式圆腹罐(1987VIM49:1) 25. C型III式圆腹罐 29. A型鬲(1982IXH12:2) 30. B型I式鬲(1982IXM10:6) 31. B型II式鬲

圆腹罐		鬲	
B 型	C 型	A 型	B 型
Bb 型			
			
			
			
			
			

葬陶器分期图

M57:6) 5. Ab 型 II 式鼎 (II M105:4) 6. Ab 型 III 式鼎 (VM15:16) 7. B 型 I 式鼎 (IVM25:2) 8. B 型 II 式鼎 (南寨鼎 (1984 VM5:2) 13. A 型圆腹罐 (II · VM57:7) 14. Ba 型 I 式圆腹罐 (东下冯 M503:1) 15. Ba 型 II 式圆腹罐 (V 19. Bb 型 I 式圆腹罐 (1983 IXM20:1) 20. Bb 型 II 式圆腹罐 (IVM8:6) 21. Bb 型 III 式圆腹罐 (IVM18:4) 22. Bb 型 IV 式 (IVM9:4) 26. C 型 IV 式圆腹罐 (1987 VIM20:1) 27. C 型 V 式圆腹罐 (1987 VIM57:16) 28. A 型鬲 (II · VM57:8) (1987 VIM49:2) 32. B 型 III 式鬲 (1985 VIM7:1) 33. B 型 IV 式鬲 (VM22:8)

期	器 型 式	盃		爵		
		A 型	B 型	A 型	B 型	
				Ba 型		Bb 型
一 期	1 段					
	2 段					
二 期	3 段					
	4 段					
三 期	5 段					
	6 段					
四 期	7 段					

图一 二里头文化墓

34. A 型 I 式盃 (南寨 M3:6) 35. A 型 II 式盃 (IVM18:7) 36. B 型 I 式盃 (IVM8:9) 37. B 型 II 式盃 (VM23:1) (1987VM57:19) 42. B 型 VII 式盃 (II M101:1) 43. A 型爵 (南寨 M3:4) 44. Ba 型 I 式爵 (II · VM54:7) (1980VM3:7) 49. Ba 型 VI 式爵 (1984VIM11:20) 50. Ba 型 VII 式爵 (1984IVM13:3) 51. Bb 型 I 式爵 (VM22:1) (IVM26:5) 56. II 式觚 (南寨 M3:3) 57. III 式觚 (1987VIM49:6) 58. VI 式觚 (VIM18:3) 59. V 式觚 (南寨 31:3) 64. Aa 型 II 式豆 (IVM6:7) 65. Aa 型 III 式豆 (1987VIM25:3) 66. Ab 型 I 式豆 (东马沟 M6:3) 67. Ab 型 II 式 71. Ab 型 VI 式豆 (1984VIM3:3) 72. Ab 型 VII 式豆 (VM21:2) 73. B 型 I 式豆 (II · VM57:3) 74. B 型 II 式 78. B 型 VI 式豆 (南寨 M28:5) 79. B 型 VII 式豆 (VM21:5) 80. C 型 I 式豆 (1980VIM5:1) 81. C 型 II 式豆